

汉译经典

FRANCESCO GUICCIARDINI: RICORDI

圭恰迪尼格言集

〔意大利〕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 著

王 坚 译 刘训练 校



译林出版社

汉译经典

〔意大利〕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 著
王 坚 译 刘训练 校

圭恰迪尼格言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圭恰迪尼格言集 / (意) 圭恰迪尼著; 王坚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10

(汉译经典)

ISBN 978-7-5447-4983-1

I. ①圭… II. ①圭… ②王… III. ①圭恰迪尼 (1482~1540)
— 哲学思想 IV. ①B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05836号

- 书 名 圭恰迪尼格言集
作 者 [意大利] 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
译 者 王 坚
校 订 刘训练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刘全德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40毫米 1/16
印 张 7.75
字 数 73千字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983-1
定 价 32.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本说明

本书正文依据以下英译本译出：Francesco Guicciardini, *Maxims and Reflections of a Renaissance Statesman (Ricordi)*, translated by Mario Domandi; introduction by Nicolai Rubinstein,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5 (该书译自意大利文版 *Opere inedite di Francesco Guicciardini*, ed. Giuseppe Canestrini, Firenze, 1857, Vol. 1, pp. 81—224 : “Ricordi politici e civili”), “英译者序”即取自该书。

本书正文 C 辑在翻译时，还参考了：Francesco Guicciardini, *Selected Writings*,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Cecil Grayson; translated by Margaret Grays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该书《格言集》部分主要依据 Spongano 编辑的 1951 年佛罗伦萨 Accademia della Crusca 版译出)。“圭恰迪尼的生平与著作”即取自该书的“导论”。

本书偶尔也参考以下两部早年的英译本：*The Maxims of Francis Guicciardini*, translated by Emma Martin, London, 1845 ; *Counsels and Reflections of Francesco Guicciardini*, translated by N. H. Thomson, London, 1890 (这两部英译本很容易找到网络电子版)。

圭恰迪尼的生平与著作

塞西尔·格雷森 (Cecil Grayson)

1494年，当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侵入意大利时，在人们的记忆中已成为稳定与繁荣黄金季节的“豪华者”洛伦佐 (Lorenzo the Magificent) 时代，终于落下了帷幕。三十多年下来，意大利成为他国势力逐鹿的对象，也做了教皇与君主们野心和阴谋之下的猎物。这场“悲剧”演出到最后一幕，罗马遭洗劫 (1527年)，佛罗伦萨共和国走向终结 (1530年)，在查理五世手上，神圣罗马帝国 (以下均简称为帝国) 大业卒得以完成。历经诸般繁复而又时常激烈之变动，受此磨练，近代第一位伟大的政治理论家与第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亦一起呱呱坠地。这就是马基雅维利与圭恰迪尼。两人都是佛罗伦萨人，而且均在意大利军事、外交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尽管他们的人生之路各有交叉，并因为相互赏识、共同关注意大利福祉而结为好友，但是，论起两人的角色与个性，却存在广泛的差异。

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 (Francesco Guicciardini) 似乎就是为权力与责任而生。他生于1483年，出身于一个古老而丰裕的佛罗伦萨之家。他的家族与当权的梅迪奇关系密切，并且频繁地在政府任职。圭恰迪尼很走运，因为他父亲皮耶罗避免对人做政治承诺，所以历经1494年梅迪奇被逐、萨沃纳罗拉共和国 (Savonarolan Republic, 1494—1498) 时期、对共和国 (皮耶罗曾对之寄以同情) 的反对、1512年梅迪奇复辟，他都能幸存下来，从未失宠。

圭恰迪尼接受早期教育，并在佛罗伦萨、费拉拉（Ferrara）、帕多瓦（Padua）学习法律，就主要是在这段时期内完成的；与此同时，比他大 14 岁的马基雅维利，已经担当服务国家的大任，做了驻法兰西、切萨雷·博尔贾（Caesar Borgia）和罗马的使节。

1503 年，圭恰迪尼碰上一个机遇，可以去做教士，而且可能“成长为教会中的要人”，但他父亲反对他走这条路。从圭恰迪尼自己的《回忆录》（*Ricordanze*）——这是一本描绘他个人职业、事务的日记，也是了解其早年生活的主要材料来源——所表现出的态度看，显然他的动机不在于宗教信仰，而是要做大官、建伟业。他父亲向儿子讲是非，不许儿子这样做，因为他不愿让“子嗣中有一人为贪慕高官厚禄而去做法士”。圭恰迪尼读完博士后，开始从业做律师，并任大学讲师（1505—1506 年）。这时，他渴望与亚拉马诺·萨尔维亚蒂（Alamanno Salviati）的女儿玛丽娅（Maria）结为伉俪，因为他们那个家族有钱有势，能对他以后的事业发展大有帮助。在这件事上，他父亲的提醒成了耳边风。《回忆录》中的记载表明，圭恰迪尼为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这一步棋倒是没有走错。此次结合，给他带来了不少委任状，还有诸多其他回报，并且帮助他在佛罗伦萨社会及各种交际场合中表现得老练成熟，从而为下一步进入政界开启了大门。他得意洋洋地记述了自己如何被选任到各种与法律有关的职位上，这些官帽背后自然跟着高薪，但使他最为得意的是戴上官帽后，他就能在博士同侪中鹤立鸡群。他还得意地讲自己参加参议会时，是屋子里面最年轻的成员；又讲到与竞选对手相比，他得着了更多的票数。他并不看重低金钱上的回报。相反，在《回忆录》中，他宣称自己对财富的关注是持续的，对收支状况，也总会多留几个心眼。这些都是对其个性中若干侧面的最佳写照：对权力和位置看得极重；对看得见摸得着的成功标志，也决不放手。在他那个年代的佛罗伦萨社会，要做这样的成功者，以法律为职业，自然是最适合不过了；而且，与

萨尔维亚蒂结盟，也最能让他得势。因此之故，1509年，他岳父49岁便早早谢世一事就无异于是对他的狠命一击了——“靠了他，我才积累起如此多的资本”。

不过，这场变故并没有打断他进取的雄心。1511年，他28岁，被任命为驻西班牙国王斐迪南（Ferdinand）宫廷的大使。这个决定委实难下：放弃他那正如日中天的法律工作，或许是无益的；要么就接受委任，体面地到那个天主教徒君主的宫廷里去任职？荣耀，还有丰厚的金币薪酬，魅力无可抵挡。于是，他于1512年1月29日出发，从陆路经阿维尼翁（Avignon），耗时两个月，抵达布尔戈斯（Burgos）。他做了为期两年的大使，不过外交上很难说有什么成就。他们交流的节奏太慢，总是赶不上事情变化的步伐。1512年8月，佛罗伦萨爆发了一场革命：依附于法兰西老盟友的皮耶罗·索德里尼（Piero Soderini）政府倒台，梅迪奇复辟。表面上，这场复辟打的是梅迪奇的私人旗号，实际上，他们却是与包括西班牙在内的神圣同盟联手而来。圭恰迪尼抢先一步跑到国外而得以躲开的危险，就这样登场了。不过，他却由此而得以显贵。在他离开的期间，前度委任他的政府已经被梅迪奇取而代之，但他却以家族传统智慧，又得到了梅迪奇的宠幸。他回国后，经验与钱财两丰收，即使是更为重要的职位，也能胜任了。

与此同时，又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乔瓦尼·德·梅迪奇（Giovanni de' Medici）当选为教皇利奥十世；圭恰迪尼回国不久后，父亲即去世。这对于圭恰迪尼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对父亲衷心地热爱、崇敬，所以后来在《回忆录》中，他难得一见地为此抒起情来。不过，利奥的上台，对他来说，却是一件难得的好事。这对他此后很多年里的职业方式，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1514年早些时候，他回到佛罗伦萨，便重操旧业，开始将自己积聚下的财产投资于家室及其它业务，并为日渐扩大的家庭预算做准备。他被委以重任，出任政府要职，除1514年一度被冤枉

外，一直受到梅迪奇的宠幸，并最终于 1516 年 6 月得到教皇的任命，成为摩德纳（Modena）总督。1517 年 7 月，他还被补授为雷焦（Reggio）的统领。这些市镇本是 1512 年从费拉拉公爵（Duke of Ferrara）手上抢来的，现在成了教会的地盘。对圭恰迪尼来讲，这些地方的境况真是一个挑战——派系斗争造成的分崩离析，武装团伙的遍地施虐，以及经济的凋敝，这些都需要由一个铁腕人物来收拾。圭恰迪尼对这些重任应付裕如。他正派而不留情面，在那里铲除嗜血的争斗，去纷扰，存秩序，使得敌人惧、人民敬。1521 年，教皇与皇帝查理五世一起，对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 I）打了一个胜仗；教皇吞并帕尔马（Parma）后，也将它划归到圭恰迪尼的管辖范围之下。圭恰迪尼赶到那里，正是时候。在他主导下，跟法兰西打了一场著名的保卫战。主持这次战事，后来还被他认为自己职业生涯中最有光彩的成就。这一年，利奥十世谢世，当选为新教皇的阿德里安六世（Adrian VI）让圭恰迪尼继续留任。1523 年，朱里奥·德·梅迪奇（Giulio de' Medici）在阿德里安之后即位，是为克雷芒七世（Clement VII）。他将圭恰迪尼提升为罗马涅地区（Romagna）最高长官。这样，圭恰迪尼就成为教皇国中亚平宁山脉（Apennines）以北的实际统治者。

诸如此类的任命，给了圭恰迪尼梦想中的荣耀与财富。他肩负重任，君主气派十足，而且有名有实。他发出的话，在一大片土地上，就跟法律一样。他可以毫无愧色地宣称：再没有一个佛罗伦萨人，能在这么些年里，得到如此光荣伟大的驻外委任；几代人里也不会再有这种事了。后来，人们尽管对他多有指责，但是，他却从来不曾为谋取私利而滥用职权。他积聚的财富，都是取自正道。他在罗马涅地区给人的印象，和在其它地方一样，于公于私都绝对是一个谨言慎行的正派人士。

在那些年里，他结识了马基雅维利。后者于 1512 年丢官，又慢慢地与“梅迪奇家的君主们”重建联系。他已经写出了《君主论》

和《李维史论》(*The Discourses*)，现在正忙于撰写梅迪奇吩咐他的佛罗伦萨史。卡尔皮(Carpi)托钵修士的寒酸使者，与梅迪奇教皇治下北意大利有权有势的世俗代理，两者之间的区别可谓天上地下。然而，他们的结交却是迅速而持久的。他们口头交流过对意大利与欧洲政治形势的看法后，又继续通信。马基雅维利活力十足而又幽默诙谐，他给稳重端庄而不苟言笑的圭恰迪尼带来了难能可贵的嬉闹活泼。他们两人一起，跟托钵修士玩了一个恶作剧；对马基雅维利戏剧《曼陀罗花》(*Mandragola*)的头一个版本，圭恰迪尼还负起了责任，并打算与马基雅维利合作，在法恩扎(Faenza)将它搬上舞台。

在那些年月上演喜剧，可不太合适。弗朗索瓦一世与查理五世在意大利的争斗日趋白热化，以至于生性犹疑的克雷芒七世，也不得不在两军争锋中做出痛苦的选择。他们的较量，始于1521年，但似乎到历时长久的伦巴底(Lombard)一役，帝国军队在帕维亚(Pavia)之战中生擒弗朗索瓦一世(1525年)后，才得以告一段落。这里没有什么可含糊的，不过，法兰西国王将会信守承诺了要给他豁免权的马德里条约；倒是克雷芒在圭恰迪尼挑拨之下采取的行动，最终加速了意大利毁灭性灾难最后一幕的到来。帝国势力在意大利的增长，让教皇慌了神。教皇召回圭恰迪尼，让他到罗马来做自己的顾问，在其建议下，教皇还组建了科尼亚克同盟(the League of Cognac, 1526年5月)，与威尼斯、米兰，还有弗朗索瓦一世一道，共同反击查理五世，以将帝国势力赶出意大利。圭恰迪尼被委任为教皇的副手，到了驻伦巴底同盟军的军事统帅乌尔比诺公爵(Duke of Urbino)手下。圭恰迪尼希望速战速决，结果公爵拖泥带水，致使战役大败亏输。罗马反遭攻击之后，教皇被逼无奈，只得签下停战协定；不过，他接下来并没有遵守它。他重新攻打那不勒斯，结果却又被迫另签一个停战协定，并解散了他的部队。与此同时，在北边的帝国军队在波旁(Bourbon)率领下，开始向南进军。深信停战协定的克雷芒，

并不如圭恰迪尼那般惊慌。后者调遣同盟军去保卫佛罗伦萨，他们及时赶到，制止了一场针对反梅迪奇统治初发叛乱的残酷镇压。但是，波旁却绕过了佛罗伦萨，他在同盟军的尾随之下，一路畅通无阻，麾师罗马。在罗马，教廷的兵力根本不足以阻挡其进军，所以尽管波旁授首，他的部队仍得以进城，并肆行劫掠（1527年5月）。

罗马遭洗劫、克雷芒囚于圣安杰洛（Sant' Angelo）城堡之后，紧接着的是梅迪奇在佛罗伦萨的统治被推翻，共和国以尼科洛·卡波尼（Niccolò Capponi）为正义旗手（Gonfalonier），重新开张。这些变故下来，圭恰迪尼的事业一落千丈：他不做罗马涅地区最高长官，做了克雷芒的大臣；他想出妙计，组成联军，结果却主要因为乌尔比诺公爵的无能与克雷芒的蠢行，终致灰飞烟灭。历经11年长期在外的梅迪奇宠臣生涯之后，他现在几乎已是别无选择，只得回到这个刚刚轰走老主人的城市里，做一个布衣公民。尽管他仍有望可以去影响新政府，而且他与卡波尼关系也不错，但是，想在这时再得到善待，却只能是奢望了。陷入困境当中的他，显然再也无暇来为马基雅维利之死（1527年6月）伤感。和其他往日里支持梅迪奇家族的人一样，他现在苛捐杂税缠身，之前在罗马涅地区精心储备起来的金币，亦被盘剥一空。他还被召去，对佛罗伦萨为同盟军提供的支出做解释。在官方的质问下，他终得以洗清侵吞公款的污名。尽管他还在为教皇的康乐而忙活，并期盼重返罗马涅地区，但无可掩饰，事实却是他已经从显赫、有权有势而受宠的人上之人，沦落为一个置身于对他充满敌意的社会之中，且实际上处于无业状态的公民了。

在斐洛切托（Finocchietto）的庄园里，圭恰迪尼对自己命运的急转直下做了反思。他是为躲避一场突发的瘟疫来到这里的，他的一个女儿于此时去世，也让他备感神伤。他在一封慰藉信中对自己的成败得失重新做了评估，并虚拟了一份写自己和自己在佛罗伦萨政府前所作所为的控辩报告，聊以自慰。往事如烟，回

想起来，怅然若失。当他沉思、玩味并琢磨起自己的钱权两失、与克雷芒共同进退，以及那条关于同盟军的毁灭性建议时，宗教和哲学都不能成为安慰他的好药石了。一切的一切，尤其是那条同盟军的建议，成为他良心上的最大负担。因为正是这条馊主意，使得尽人皆知，全意大利现在都陷入了至为凄惨的境地，而他自己，也做了自身雄心的牺牲品。

之前，政治活动是圭恰迪尼的全部生命；现在，他几乎从全身息影。他新近到手一个新庄园，该园位于圣玛格丽塔（S. Margherita），名为蒙蒂奇（Montici）。在这里，圭恰迪尼开始为写作佛罗伦萨史收集材料。他上溯到 1375 年，以之为开端，然后从编年史家及其他诸子百家中广为取材，并做精心汰选。后来，他放弃了这部作品（发现于近年间，并被赐名为 *Cose fiorentine*），取而代之的是另一部视野更为广阔的史书。在这段时间里，他还将自己的沉思予以笔录或重写，并以《格言集》（*Ricordi*）为题，流传至今。圭恰迪尼并不打算将这本书公之于众，但他记下了自己的体察与教训——多年来，他一直为此笔耕不辍，现在，他的人生经验已臻于炉火纯青，于是又将它们重制或提纯。1530 年，当圭恰迪尼为这些格言做了“最后的”增补和重订之后，他的境况又起了变化。

1528—1529 年间，佛罗伦萨与教皇的关系恶化。当查理五世最终战胜了同盟军后，克雷芒与他签了一个合约，要把梅迪奇重新扶上佛罗伦萨政坛。那时，反梅迪奇党人不顾迫在眉睫的危险，反而愈加盛气凌人。谣言传来，要将圭恰迪尼打入大牢，或是流放。1529 年 9 月，帝国军队在奥伦治亲王（prince of Orange）率领下，进军佛罗伦萨城；与此同时，圭恰迪尼选择了自愿流放。佛罗伦萨打算抗战到底，于是，永垂史册而壮烈非凡的围城之战便开始了，它出人意料地持续了近一年之久。当时，圭恰迪尼前思后想，内心激荡，好生矛盾。对佛罗伦萨人认他为反贼，他心中愤懑，

恨不得把教皇引进城来，替他报仇雪恨；不过，他对佛罗伦萨自由政府又毕竟颇有好感，有心回护，故而取舍难定。他在里米尼（Rimini）碰上了克雷芒，于是居中说项，请其许佛罗伦萨大使以优越的投降条件。然而，这不过是白费心机而已。顽固的佛罗伦萨政府不但不领圭恰迪尼的情，还将他传讯，让他到法庭上去应对合谋反对国家的指控。1530年3月，他遭官方放逐，家产充公。这样一来，虽然之前要投靠故主，他心中犹有疑虑，但到现在，去和罗马的克雷芒结为一体，却再也不必顾忌什么了。

这一年，经历这种种世事之后，圭恰迪尼又给他的《格言集》添加了一些新的体会，还删节了许多其他的内容。这本书，以其对人之本性及行为（尤其是政治行为）的深入思考，与对圭恰迪尼本人处世哲学及所作所为的深刻反映，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兴趣。自百余年前，它第一次全文出版以来，有人对之赞不绝口，也有不少人对其心存反感。后面这种反应，在某种程度上与人们不满圭恰迪尼在佛罗伦萨历史上后来某个时期所扮演的角色，由此对他产生成见，也有一定关系。除此以外，他冷酷的现实主义，他的汲汲于名利，以及他在宗教虔诚、个人伤感和脉脉人情味上的明显缺失，也表明他是一个只受理性算计及宏大欲念支配的人；这样一种个性，并不受人欢迎。在《格言集》中，那些直白而又时常带着箴言式简洁的话，确有可能给人造成上面这种印象；不过，它却常常掩饰了那些天生不信任个人情绪而喜欢约束之、且如非必要永不言弃的人心中的真实张力。圭恰迪尼笔下的体会与“警句”，与其友人马基雅维利写的东西（尤其是《君主论》），在很多地方恰成一致。由此，他还曾经被认定为“第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不同的是，马基雅维利以其热情洋溢的现实主义，抵消了上述特性；这还给他带来了十足的魅力，尤其在意大利复兴运动（Risorgimento）当中更是如此（今天对我们来说，亦如此）。他和圭恰迪尼两人的共同特色证明：他们的时代，佛罗伦萨的特殊状况，

还有梅迪奇，赋予了他们（或许还有更多人）颇相类似的对人类和社会的看法。因此，把《格言集》放到那段风云激荡的时代情境之下，并考虑圭恰迪尼在当时政局中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不是以此作为衬托，而是以之为必不可少的钥匙来阅读并评鉴，就比什么都更重要了。他的格言集，应当被视为是作者在不同时间、思考不同问题时做出的一系列私人评论，而不应被看做一个有系统或是哲学性的完整有机体。这中间，除了某些圭恰迪尼有意为之、从不回避的前后矛盾以外，它们描绘他的个性、观点，呈现出极为连贯的图景。对其主要特色，上文已经有所触及；但仍有一些，还得继续说说。

从圭恰迪尼的某些论道中推出他不关心伦理道德与宗教事务，或是想将公共行为与道德原则分家，却是错误的。他独特的经历，不断地使他要去面对怎么处理道德与成功之间关系的问题。马基雅维利从来没有像他那样位高权重，所以在这一点上，还颇有不如他之处。圭恰迪尼做了教皇治下的总督，引导他的其实正是他自身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还有正道直行的想法。不论在《格言集》中，他有没有直接说破这层意思，总之，在全书中，这些理念却是贯穿始终的。当然，他和马基雅维利一样，都强烈地认识到，仅有德性还不够，邪恶与无知常常得势；而且，即使是至为正义的事业，也可能因为运气太坏而遭损毁。这些认识，使得圭恰迪尼常常聚精会神于权宜之计，或是那些为了生存和成功而有必要去做的交易。在一个并非人人都是好人，欺诈或许比诚实更能使人得利的世界里，那些想要发达或是做统治者的人，选择总是有限的。对德性、事功均不想放弃的人，意识到个中困境，心中不免一边充满悲悯，一边却丝毫不减其现实主义的目光。

马基雅维利坚信，博通古今，即可找到人类历史的某些典范，并能使政治生活臻于完美；圭恰迪尼却绝无这种自信，对以通则或先例来决定人的行动，他不以为然。在《格言集》中，他一再

拒斥以罗马为范例（见 C 辑第 110 条）、以逻辑推演来预测世事（见 C 辑第 114 条，亦参见 C 辑第 182 条）、假想中可以之衡量万物的同一标准（见 C 辑第 6 条），显然，这都是在有意暗指他的朋友。在他看来，与此相反，天下万事，都只能日渐一日，凭借个人经验赋予我们的洞察能力与先见之明，而不能凭借书本来予以解决。这种不同，理所当然，应该视为这两个佛罗伦萨人之间根本的差异：他们一个秉承了 15 世纪人文主义的特色，对人的能力持宽泛的理想主义看法；另一个则面对着时代的风云变幻——从文艺复兴到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这一时段——产生了人力有限的见解。

《格言集》中出现的这种差异，更明显地可见于圭恰迪尼的另一部作品——《马基雅维利〈李维史论〉的评论》（*Considerazioni intorno ai Discorsi del Machiavelli sopra la prima deca di Tito Livio/ Considerations on Machiavelli's Discourses on Livy*）。这部书是他在罗马时开始写的，最后未成全璧。马基雅维利对罗马共和国深为激赏，并且深信人性不会变，历史会不断重复，通过考察过去，尤其是罗马的过去，就可以为任何现有的政治问题提供借鉴。受此激发，他作《李维史论》。尽管他也坚信，有时由一个强人来统治，确有必要，但是，他却表达了自己强烈的共和主义信念，并对大众政府信心十足。对马基雅维利的这些看法，圭恰迪尼的《评论》虽然在很多地方是同意的，但是，他所表达的信念却几乎与之全然相反。他对政治上的一般法则，总是狐疑不信的。马基雅维利划上等号的地方，他偏分得清清楚楚；马基雅维利从历史上找出的典范，他要使之土崩瓦解，站不住脚；对马基雅维利所举的事实，他以详尽的分析、时常更为准确的资料，来对之做比较、修正和限定。尽管圭恰迪尼对人类天性向善寄以相当的信心，不过，他绝不同意马基雅维利所坚称的罗马提供了一个万世不易的典范，或是人民群众能被委以决定政治的重任。他自己的见解（同样可

以见之于《格言集》)，就是赞同一个由有能力、称职，而且为大众利益服务的少数人来统治的政府，赞同那种 15 世纪已然流行于佛罗伦萨的由精英主导的共和主义，反对他同时代那种扩大参议会，从而赋予无知无能者以政治权力的做法。^① 另一方面，对马基雅维利之情有独钟于仁慈君主，圭恰迪尼也不敢苟同，他宁愿见到善存在于包纳了正义与良制的政治系统当中。在这一点上，圭恰迪尼比马基雅维利更现实，他的观点，反而更为贴近马基雅维利自己所谓的“具有实效的真理”（*verita effettuale delle cose*）这一说法。马基雅维利把史料用于支持他从罗马史中拈出的典范模式，圭恰迪尼却从这些史料出发，小心求证出带有限定性的结论。作为一个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利以历史展现出他对人与事的把握之宽广有力和富于想象。与之对照，圭恰迪尼则对自己所处的世界了解透彻，拿出来的都是精良而稳健的见解。总之，再没有别的书，可以比这两本评论更能凸现马基雅维利与圭恰迪尼之间的相同与差异了。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两位著者的观点与学术特色，它们实在是大有帮助。

有一点，至少是他们两人都同意的——就是教会不但腐败，而且要为意大利的毁灭与分裂负很大的责任。圭恰迪尼不是一个“信仰虔诚的”人，但是，宗教原则却是他为本人的根本。他以诚实、讲道德的方式，来体现其对宗教原则的关注。他从他父亲身上继承了某些恻隐之心（*Piagnone sympathy*），《格言集》中 C 辑第 28 条所述，便是例证。以他曾在梅迪奇教皇手下服务多年，来对之进行驳难，却是将事情估计得过于简单，而且是对他职业生涯的误解。依着古老的家族传统，他与梅迪奇牵牵连连，自 1512 年起，他的命运便与之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了。梅迪奇对他的宠幸及委任，

^① 在《关于佛罗伦萨政府的对话》（*Dialogo del reggimento di Firenze, 1521—1522*）中，他重谈什么样的政府最适合佛罗伦萨的问题，结果是基本上倾向于建立一个像威尼斯政府那样的体制。

使他得以在追求荣耀与财富上一展自己的抱负，并维持好自己日渐庞大的家庭。在罗马涅地区，他虽是由教廷指派，却按他自己的主张，成功地统治了那里。这样做，他不独是为主人服务，意在扩大梅迪奇的基业，更是为自己及自己治下的百姓们服务。人们确实应对之感恩，因为那时梅迪奇确实就是代表了佛罗伦萨，而在上一个世纪，他们还是做了不少好事的。1527年，梅迪奇统治成为明日黄花，如果佛罗伦萨需要圭恰迪尼变换身份继续为城邦服务，他还是会很乐意接受的。佛罗伦萨拒绝了他的服务，而且将他的好感置之不理。1530年，圭恰迪尼之所以做出那样的抉择，此处种下的因缘，要远远超过他对梅迪奇的忠诚。

1530年9月，在帝国军队的围攻之下，佛罗伦萨终于投降。克雷芒遣圭恰迪尼来处理一应事务，并处罚反对派领袖。圭恰迪尼下手过狠，从那时起，他便因此事而累及自己的声名。正义旗手卡尔杜奇（Carducci）及其他人被审讯、拷打，最后斩首。还有很多人被判放逐。前政府里面的主要人物，没有一个得到了宽大处理。圭恰迪尼的报复行为，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决意要为城邦的利益而做清道夫，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要了却与那些曾经驱逐并盘剥过他的人之间的个人恩怨。要为他这种行为美言几句，恐怕只能追溯到他们在他们手上时，也并未得到宽大的处理。

1531年，圭恰迪尼请求回罗马涅地区去，刚好那里也有一些市镇想请他回去（与他过去的政绩无关），但是克雷芒却将这个位子给了他的对手巴乔·瓦洛里（Baccio Valori），而将他委任为博洛尼亚（Bologna）副领主。博洛尼亚人原本是怕他的，但很快就对他尊敬有加了。圭恰迪尼又像以前一样有钱有势，不过为时并不长久。1534年，克雷芒薨，圭恰迪尼重回佛罗伦萨，充任当时城邦实际统治者亚历山德罗·德·梅迪奇（Alessandro de' Medici）的手下。按他过去的作为及品性，他这样做是自然而且必然的，就像他接下来在那不勒斯履行职责，为这个很不中用的梅迪奇进

行辩护一样。那时有佛罗伦萨流亡分子在查理五世面前指控亚历山德罗·德·梅迪奇，圭恰迪尼的辩护就是在查理五世面前做的。当时以降，这次辩护使圭恰迪尼遭到了严厉的批评；人们谴责他，没讲一句好话。圭恰迪尼是否真心相信自己口中的话，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搞清楚。他既已投身侍奉并支持梅迪奇，便难以回绝这一类工作。他当然也有其他选择：在佛罗伦萨靠边站，或是被逐离城市。圭恰迪尼没有这样做，他的选择，责任与其后不可避免的后果当然都应由他自己来承担。亚历山德罗放荡无行，与他的首席顾问相比，恰成对照。1537年，亚历山德罗为同族洛伦齐诺（Lorenzino）所杀，一点也得不到人们的同情。流亡分子们的希望破灭了，接下来，主要是在圭恰迪尼的唆使下（他极力想避免重返大众政府），帝国正式批准著名战士乔瓦尼·德·梅迪奇（delle Bande Nere）之子科西莫（Cosimo）继位；流亡分子们兵败势微，一齐被赶走了。对那些被抓的领头人及同情者，年轻的科西莫残忍无道。圭恰迪尼本想对他施以影响，然而结果不但没有成功，反而连自己那个顾问的位子也丢掉了。最后，圭恰迪尼终于梦醒，于是退出公共生活，回到庄园，集中他晚年的精力，一心著述《意大利史》。1540年5月23日，他去世了。

这部他自己没能为之命名的高质量著作（1537—1540），详尽地写了1494—1532年间的历史。与以往以单个城市或国家为对象的史书（圭恰迪尼自己就于1509年写了一本《佛罗伦萨史》，涵盖了1378—1509年间史事）不同，这部书先把意大利视为一个民族国家整体，再来给其修史。他所取的材料，里面有他自己因为身居高位、处于事件中心而得来的直接经验，也有各种文件及正式公函，尤其是那些他有机会搜罗到的佛罗伦萨函件。16世纪以来，随着它早年即以各个语种广泛传播，这部史书以其对意大利历史上最关键而且复杂的时期作了大手笔的阐释、分析而口碑载道。它现在还是有关那段时期历史知识的主要材料来源。尽管圭